

中國對和平運動 有何觀感？

韓德民著

梁潔芬譯

一九八一年夏秋之間，有大量人群湧至歐洲各城示威，反對在歐陸部署新中距離飛彈。單單在十月就有一百萬男女老幼參加這項和平示威，包括三十萬人在波昂，二十五萬人在倫敦。這是史無前例之舉。

在比京布魯塞爾聚集了二十萬人，是戰後比利時最大的一次示威，尙未包括未能趕到首都以千計失望的人群，他們把全國火車站塞得水洩不通。在羅馬就有三十萬意大利反對軍備競賽的示威者，操向駐意大利的美國及蘇聯大使館。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提出兩個簡單的問題並加以討論：(一)中國對上述的和平示威運動有何觀感？(二)對於那群備受核子威脅而感到人類有同歸於盡的危險的科學家、醫生及宗教領袖們，以及成千上萬普羅大眾所不斷擴大的呼聲、中國政教領袖會否響應？這是害怕人類文明將毀於一旦的老問題，而中國的領袖亦經常提及這個威脅。從第二項問題亦會引伸出譴責核子武器之爭。日本主教團曾公開譴責核子武器競賽，繼而要求將這筆款項改作其他積極用途，中國的教會領袖會否就此作出檢討及參與行動呢？某些宗教領袖在談到核子問題時，到達措詞激烈，毫不留情的地步。美國天主教主教們譴責這惡性循環的核子武備是絕對的不道德，擁有足以毀滅全城的武器已被視作違反人性的罪惡，這些倫理上的控訴使教會領袖用措詞激烈的句語去忠告群眾。如果一個人良心上不同意使用核子武器的話，他該仔細考慮應否在製造及部署這種可怖的核子武器上拒絕合作。

蘇聯的軍事力量是否那麼龐大？

中美關係因列根政府的售賣軍火予台灣而倒退。兩國曾一度擁有的正常關係，會因美國的未明確外交政策以及不顧政治上的分歧不斷地售賣軍火，而遭受傷損。從意認型態的角度去看，中美雙方領袖分屬不同領域，差距非常之大。但二者認定蘇聯為共同敵人。中美政治領袖對蘇聯的勢力擴張終日憂心忡忡，認為擁有核子武器是阻撓蘇聯霸權主義的唯一可行途徑。但不可以忽略的問題是：擁有多少軍備才足夠？一旦核子戰爭意外爆發，情況會如何呢？列根總統在這問題上的開支似乎要超過蘇聯，他的政策顯而易見地是「寓裁軍於軍備競賽之中」。在本世紀中，甚至最富有的國家都無力承擔軍備競賽的龐大開支。為了全球的安危，他們趁未捲入核子武器的無底深淵之前，應急流勇退。參與一九八一年龐大反核示威者的動

機，都是害怕「廣島事件在歐洲重演」。如果國際領袖對核子武器競賽不加控制，不予以責備的話，那麼群眾便會挺身而出，採取行動。也許基於對共同敵人的恐懼，列根總統和中國政要認為一九八一年的和平示威運動是蘇聯幕後策劃的把戲。十一月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四十萬人的示威，被中國輕蔑地稱之為「荷蘭人反對戰爭的病症」。

列根總統堅持成見，認為贊助歐洲各地巨型集會的「全球和平協會」已被蘇聯收買。中國稔熟的專欄作家詹姆士·雷斯頓（James Reston）寫道，國務卿海格及白宮的幕僚長柏加（James Baker）合力說服總統，使他相信「這些示威遊行不是由莫斯科資助的過渡性陰謀，而是發生在教會及大學內的一種反感，因此要從軍事及論理方面提出解釋。」（「紐約時報」，八一年十二月廿七日）

美國、中國及其他地方的觀察家，若要把策劃示威之事歸功於克里姆林宮軍事人員的話，仍需找出證據，證明蘇聯會在歐洲各地煽動及資助這些騷動事件。在「限制核戰」問題上，也許華府及五角大廈的官員所發出的輕率談話引致成千上萬的歐洲人惶恐終日呢？

法國土魯斯天主教大學神學教授高士德（René Coste）對歐洲和平運動有不同的見解。高氏承認在較早時期共產黨曾助反核子運動一臂之力，但到近期，反核子運動的推動力却來自參與示威抗議之科學家、醫生、環境學家及婦女團體，因此共產黨的參與程度已經相對地不顯著。歐洲的年青人並沒有在一九四五年才結束的大戰的經歷，然而他們也向全球政要施加壓力，使他們覺醒和保障全人類的前途。

和平主義或社會暴行？

中國抱着懷疑的態度去看這兩個超級核子強國的裁軍談判。「中國不反對這些談判，但談判似乎進展非常困難。談判本身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和緩緊張的國際關係。」（「北京周報」，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這種對限制核備談判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而這種憤慨之情也是群眾抗議的一個原因。

在全球每年五千五百億美元的軍費中，核子武器佔了一千億美元。若軍事競賽對人類的真正發展有害，那麼核子武器的螺旋式的擴展的確擁有自我毀滅的成份。我們的社會現在平均每年花在武裝一名士兵身上的是一萬六千美元，但同時期花在教育一名孩子身上的僅得二百五十美元。（「全球軍事及社會開支」，一九七九年第五頁）

歐洲和平主義者所特別反對的，就是有計劃地在一個已豎起七千枚火箭的細小區域內，再部署更多核彈頭。難怪西德總理舒密特這樣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五角大廈的顧問：「若要在美國俄立岡州計劃部署數以百計的火箭，你們豈非要面對很多反抗的勢力嗎？」

若形容歐洲人是反對核子戰爭，倒不如叫他們為「維護前途的一群」更為恰當。在過去十八個月內，美國核子警報系統，錯誤地發出蘇聯核襲的警報，達一百四十七次之多。若兩個超級核子強國的戰火一旦點起的話，歐洲一定會被殃及。不管是過份敏感的反應或屬有計劃的出擊，這足以塗炭千萬生靈的決定是操於一個人的手中。我們人類究竟有沒有前途？這全繫於我們能否取得核子武備競賽的政治控制權。

軍事優勢乎？平衡軍力乎？實質口是心非

中國的觀察家注意到，美蘇雙方未有移去一枚核子武器的行動，以表示對裁軍的決心。美蘇雙方都想佔盡軍事優勢而永不肯平衡勢力或佔下風，結果裁軍只是紙上談兵。其實，雙方仍在分頭繼續製造核子武器。

「蘇聯像十年前一樣推展『和平運動』，而另一方面又想與西方談判『裁軍問題』。但很多人對她七〇年代的做法記憶猶新，不會被『和平運動』之甘詞所騙。時至今日，蘇聯是否滿足於平衡軍事力量的境界？抑或它有獨佔軍事優勢的野心？如果翻閱它往日『和平運動』的事實，不難得知她要決心獨佔軍事優勢。」（「北京周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廿七日）

中國對核子武備裁軍問題態度很明朗，因為她是核子國家（美、蘇、英、法、中、印六國）的後起之秀（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才有核爆），因此他要美蘇兩個老大哥先行一步，而這兩個超級核子強國也壟斷全球，所以中國說：「正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才要求美蘇兩國先裁軍。」（「北京周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國對美蘇兩國的誠意早已懷疑，但對蘇聯的無休止軍事擴張更加口誅筆伐。在核子時代裏，如果所有核子國家放棄首次出擊的權利，全球的安危都會遭受蘇聯的威脅。

「顯而易見，蘇聯將可能利用放棄首次出擊一事，作核子訛詐，又藉其傳統的軍事優勢擴張其影响力。」（「北京周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九日）

受人尊敬的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專家們已經注意到美製武器越來越精密準確，所以未對美國網開一面。在卡達政府時代，總統守則第五十九條就是由禁核政策扭向首次出擊政策的一項轉變。

中國把西歐的和平示威列入一九八一年十大新聞之中，但「北京周報」不突出美蘇限制核子武器談判的消息，反而將蘇聯核子潛艇闖入瑞典海域作爲頭條世界新聞處理。（「北京周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四日）一九八二年中國對裁軍一事仍表示悲觀態度。

「這兩個超級強國那肯答允消除核子戰爭的威脅呢？他們只會在無計可施時，才肯毫無條件地答允自己不會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然後才肯逐步通過真正的商討去拆除核子武器的裝備。否則一切的商談及承諾都是徒託空言。」（「北京周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五日）

在這充滿暴力的世界，當國際外交要靠核子武器的威脅去撐腰的時候，中國的說話又何必裝成一派正經？除非其中一但核子國家採取戲劇性的行動去拆除武器，否則任何方面都不足以信任。在廿世紀末葉，中國無可奈何地在核備競賽中跑得最慢。中國領導人會不會在全球衆目睽睽下，主動打開美蘇裁軍僵局，先拆除核子武器呢？這個象徵性的行動，不但不會在中國的防衛上構成威脅，反會刺激其他核子國家言行相符。

再者，中國並非沒有參與分析核能威脅及和平主義者的反應。美國的核工廠平均每天出產三枚核子武器。蘇聯於競賽中決定停留在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地步。英國雖然正在經濟不景氣中努力掙扎，眼見社會開支要求極殷，但仍毅然建造每艘價值十三億美元的三叉戟式的核子潛艇。南太平洋受核塵之害的居民及保護環境者要求法國停止這種核子帝國主義行動，但法國

政府充耳不聞，繼續在南太平洋進行核子試爆。中國漠視輿論，在遼遠的太平洋海域進行核試，曾通知遠洋輪船及漁船駛離劃定區域。在這情形下，中國怎能從核網中抽離，轉而幫助歐洲的和平主義抗議西方國家的核武競賽呢？

「歐洲和平主義的浪潮不是偶然產生的，它是美國與蘇聯軍事競賽、美國與西歐的衝突以及西歐國家之間所有矛盾的產物。」（「北京周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四日）

一九八二年的聯合國會議及美國和平主義

當西歐各國政要細思在國內所掀起的反核示威浪潮的含義時，他們終於計劃於一九八二年六月舉行一個特別裁軍會議。這是一九七八年聯合國舉行裁軍會議的續會。在會中，將有一百四十多個國家聯合一起呼籲這個世代的人，爲了人類更大的和諧及裁減軍備而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教會及和平團體針對六月的會議，正在聯合計劃舉行一次周末大示威，估計數以千萬計的愛好和平人士，包括歐洲日本代表，將聚集在紐約，聯合反對核子武備。

在美國，至少有四個大型的和平巡遊在一九八二年內舉行。很可能有不少人亦會參與漫長巡遊的一小部分路程。有一隊還會在部署三叉戟潛艇（內有超過四百枚彈頭）總部出發，然後橫越美國內陸，去到救主耶穌降生的耶穌路撒冷聖地。在這隊巡行隊伍的策劃人中，有一名是天主教神父，他曾是“Enola Gay”B——29型轟炸機的隨軍司鐸，該機會使廣島在瞬息間夷爲平地。

和平運動的批評者須要用實際的眼光重新衡量他們所作的分析。一位名叫鐘士（Arthur Jones）的美籍作家，在海外居留一年而重回祖國後，發現「美國主教對反核的激進態度」是一項很重要的轉變。連外教報章也有同樣的感覺，因而寫道：「反對核子武器之呼聲最响亮的就是天主教的主教。最近幾個星期，他們在全國每一個角落講及這方面的危機。」

（「亞洲華爾街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若那些眼光銳利的觀察家認爲今次在美國及歐洲的和平運動是拜蘇聯之賜，他們就大錯特錯了。無可諱言，克里姆林宮意圖在這運動中混水摸魚，從中取利，甚至在後面煽風點火。但請勿忘記，蘇聯也同時遭受北大西洋的組織及美國的壓力，要求她削減核子武備哩！

與核子火山同處

既然歷史被形容爲教育與災難競賽的紀錄，今日最嚴重的倫理問題就是，要承認我們與五萬件核子武器同時存在。斯德哥爾摩的世界和平研究所估計，在一九九〇年核子彈頭激增至七萬五千枚，還有更多國家加入核子強國的行列。在一份於一九七四年原子世紀剛開始而創辦名爲「原子科學雜誌」上，每期的封面上都印上一個「死亡時鐘」；若時鐘上指明十二時正是最後大限之時的話，現在還有四分鐘就是大禍臨頭的時刻。

中國的觀察家可否從注意蘇聯在全球的野心一事，轉而關心和平運動的不同看法呢？更進一步說，中國政教領袖可否及時聯合一切學者、科學家、物理學家、神學家及關心這問題的人士，一起去譴責核子武裝呢？